

## “中心—邊緣”的“天下”格局與巴蜀早期的對外關係

楊 民

**摘 要:** 早期巴蜀地區與中原地區存在於“中心—邊緣”的“天下”格局之內，兩者之間的關係涉及自然地理、族群及政治、文化等社會層面。巴蜀與中原世界的接觸，一方面是巴蜀地域特徵凸顯、地域形象被外界認知和建構的過程，另一方面也是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衝突或融合的過程。戰國中期以後，由於國家間疆域的拓展、“天下”觀念的強化以及中原王朝政治秩序的延伸，巴蜀地區的“邊僻”色彩逐漸減弱，深度融入華夏世界。

**關鍵詞:** 巴蜀；早期；“中心—邊緣”；“天下”；對外關係

早期巴蜀地區與中原地區<sup>①</sup>存在於“中心—邊緣”的“天下”格局之內，巴蜀與中原的關係，既涉及自然地理和族群層面，也涉及政治、文化等社會層面。因此，巴蜀與中原世界的接觸，一方面是巴蜀地域特徵凸顯、地域形象被外界認知和建構的過程，另一方面也是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衝突或融合的過程。戰國中期以後，由於國家間疆域的拓展、“天下”觀念的強化以及中原王朝政治秩序的延伸，巴蜀地區的“邊僻”色彩逐漸減弱，深度融入華夏世界。本文不擬面面俱到地进行相關討論<sup>②</sup>，而是希望結合先秦時期的“天下”格局，發掘以往研究巴蜀早期對外關係中注意不多的某些層面。

---

① 文中提到的“中原”是泛指，有時指黃河流域一帶，即傳統意義上的“天下之中”區域；有時指中央朝廷（如秦）及中央朝廷所在地的代表性文化和意識形態。實際上，與巴蜀對應的，尤其是地理意義上的“中原”也是多元的，包含有許多區域和文化。

② 相關研究可參見顧頡剛：《古代巴蜀與中原的關係說及其批判》，收入氏著《論巴蜀與中原的關係》，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71 頁。

“天下”是古代中國思想界利用空間概念建構出的一套世界秩序，是一種以“天下觀”為一體、以“大一統”和“夷夏觀”為之兩面的意識形態。它具有鮮明的人文和政治含義，既體現了“天下一家”的高級旨趣，又顯示了森嚴的尊卑等級特徵。<sup>①</sup>先秦時期，中原人所認識的“天下”，基本上分為“華夏”和“夷狄”兩類，不過由於諸多獨立國家和部落的存在，因此這一“天下”並不是一個邊界非常清楚、認同十分明確的世界。古代中國的西南地區，在“習慣”上被分為巴蜀地區和西南夷地區，巴蜀地區包括四川盆地和盆地邊緣的一些地帶，西南夷地區則包括巴蜀以南和以西的地區。從巴蜀地區與外界發生聯繫和接觸開始，就構成了外人對巴蜀地區“習慣”認知的歷史起點，而這個歷史的起點，在地域差異以及文野之別的視野下，涵蓋了兩個主要內容：一個是時人對其自然區域地理的方位認知，另一個則是察覺到了族群間的人我之異。

戰國之前甚至戰國時期關於巴蜀實際的地理位置，彼時人不可能完全熟悉。《尚書·禹貢》篇大概是中國古代文獻中最古老和最有系統性地理觀念的著作。它以地理為徑，分當時“天下”為“九州”，提出撰著者理想中的政治區劃。《尚書·禹貢》在論述和規劃“九州”的地理分佈時，其中的梁州區域比較接近現實中巴蜀地區的位置。《禹貢》載：“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西傾因桓是來。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於河。”<sup>②</sup>據此，常璩在《華陽國志》中說：“華陽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國則巴蜀矣。……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屬梁州。”<sup>③</sup>

古人對“天下”的認識還有一個“四極”的概念。對於“四極”，《爾雅》《呂氏春秋》《孟子》等書祇提到東南西北四個方位，沒有明確提到西南方的巴蜀地區。總體來看，學者對“天下”“四極”“四海”一類表述整個世界的詞彙的定義是相當模糊的，對於“天下”區域的疆域與界限認識相當有限。巴蜀地區在地理上山河攔阻、形勢險惡，自然被中土視為僻陋之鄉、荒遠之處。《山海經》一書與巴蜀地區關係密切，其中所言及的“海”，《尚書·考靈曜》訓為“晦”，本指“昏晦無所睹”，表示荒遠之地。<sup>④</sup>不過需要注意的是，由於區域觀念的局限，巴蜀存在著唯我獨尊的“本土”意識。例如在古代蜀人的視野裏，所居之地並非荒遠之處而是“天下之中”，蒙文通先生認為，蜀人定義的“天下之中”所指的即是成都

① 相關研究可參見何新華：《試析古代中國的天下觀》，《東南亞研究》2006年第1期。呂利文：《中國古代天下觀的意識形態建構及其制度實踐》，《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3期。

② 《尚書·禹貢》，《十三經注疏》（上册），中華書局影印清嘉慶二十年阮元刻本，1980年版，第150頁。

③ 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頁。

④ 李零：《中國方術續考》，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98頁。

平原<sup>①</sup>。

由於傳世文獻的缺乏，要確定時人視野中巴蜀地區所在的準確位置是不容易的，祇能粗略推知。《尚書·牧誓》記載庸、蜀、羌、髳、微、纁、彭、濮八部落曾幫助武王伐紂，武王說過“狄矣西土之人”，如果按照此說法，蜀國應該在周人的西面。不過關於“牧誓八國”的分佈，以及其來源，歷來說法不一。童書業先生認為《牧誓》所舉西戎八國，皆近漢水，巴蜀皆所謂西戎，大概本來就是漢水上游的國族，其後為秦、楚所逼迫而始南遷，最後到了戰國時期巴蜀的實際位置。

<sup>②</sup>《左傳》中記載有巴國早期的相關資料。如《左傳·昭公九年》載：“周甘人與閻嘉爭閻田……巴、濮、楚、鄧，吾南土也。”<sup>③</sup>大體可知巴為周之南土。

巴蜀作為一個並舉的地域概念，大概是戰國中後期纔形成的。在地理上，巴國的範圍在四川盆地的東部及以東的山地，其後期的中心區域為嘉陵江和長江沿岸以重慶為中心的地帶。蜀國的分佈範圍主要為四川盆地的西部，並且以川西平原為中心，北部可達到秦巴山地的漢中盆地一代。<sup>④</sup>到了戰國時代，由於巴蜀地理位置毗鄰以及二者文化上的聯繫和共性增強，與中原地區相比，地方特色濃厚。戰國中晚期，中原人士往往習慣將巴、蜀聯繫起來，或者把二者相提並論，作為一個經常性的表述對象。例如《戰國策·楚策》載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壤，秦有舉巴蜀、並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sup>⑤</sup>

## 二

我們注意到，古人的“天下”觀念不僅僅是地理性的，還是文化性的、族群性的。在古代的想象中，地理空間越靠外緣，就越荒蕪，住在那裏的人也就越野蠻，文明等級也越低。文明從中心地帶向邊緣的野蠻地帶延伸。

漢字中對“蜀”字的解釋，即體現這樣的觀念。“蜀”的名稱，來源很早，最初見於商代的甲骨文，其字形像一種模樣像蠶、但能螫人的毒蟲<sup>⑥</sup>，因此“蜀”

<sup>①</sup> 蒙文通：《略論〈山海經〉的寫作時代及其產生地域》，收入氏著《巴蜀古史論述》，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46-184 頁。

<sup>②</sup> 童書業：《古巴國辨》，《童書業歷史地理論集》，童教英整理，中華書局 2004 年版，第 244 頁。

<sup>③</sup> 《春秋左傳·昭公九年》，《十三經注疏》（下冊），中華書局影印清嘉慶二十年阮元刻本，1980 年版，第 2056 頁。

<sup>④</sup> 關於古代巴蜀地區的自然地理概況，可參羅二虎：《秦漢時代的中國西南》，天地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5 頁。

<sup>⑤</sup> 繆文遠：《戰國策新校注》（上），巴蜀書社 1987 年版，第 499 頁。

<sup>⑥</sup> 《韓非子》亦載：“鱸似蛇，蠶似蜀。人見蛇則驚駭，見蜀則毛起。”見《韓非子·說林》（下），第 137 頁，《諸子集成》（第五冊），中華書局重印世界書局本，1954 年版。相關考證可參童恩正：《古代的巴蜀》，重慶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1-62 頁。

很可能是商人對蜀人帶有侮辱或歧視性的一種賤稱，暗示這些族群不是人類，和獸類或蠕蟲差不多。春秋戰國時期中原對巴蜀的這種族群認識和身份強調，是“內諸夏而外夷狄”<sup>①</sup>夷夏觀念的直接體現。

《尚書·牧誓》記載了武王伐紂的“牧誓八國”，唐孔穎達《正義》疏：“此八國並非華夏，故大判言之，皆蠻夷戎狄屬……此八國皆西南夷也。”<sup>②</sup>《山海經·海內南經》載：“夏後啟之臣曰孟塗，是司神于巴，巴人訟于孟塗之所。”<sup>③</sup>《山海經·海內經》載：“西南有巴國。”<sup>④</sup>由此可知，至少在周初，巴和蜀已經以族名或國名活動於當時的政治舞臺上。但以中土的眼光目之，偏居西南一隅的巴人和蜀人，是中土西方的“戎狄”之屬，與庸、羌、彭、濮等族群一樣，是不能納入華夏族的範圍內來的。舊題揚雄著《蜀王本紀》記述蜀地早期歷史說：“是時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sup>⑤</sup>《蜀王本紀》雖是蜀人的記錄，但已頗有中原人的視角。從中土定義的“文化”標準來看，巴蜀地區往往被認為是未開化的地域，沒有什麼像樣的“文化”。

春秋時期黃河中下游的周王朝及晉、鄭、齊、魯、宋、衛中原諸國都自稱“中國”，將秦、楚、吳、越看作“夷狄”，例如《史記》記載：“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sup>⑥</sup>比較有意思的是，關東中原的諸國視秦為戎狄，偏居西陲的秦國卻自認為是黃帝後裔、華夏一員並以“中國”自居。當時的巴蜀地區，小國眾多，是秦人視野中的“化外”之地，故被秦以“戎狄”視之。秦惠文王二十二年（前316年），秦國朝議伐蜀一事，秦相張儀曰：“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司馬錯亦言：“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sup>⑦</sup>在征服巴蜀之後，秦又因“戎伯尚強”，“乃移秦民萬家實之”。<sup>⑧</sup>

巴蜀被秦征服後，秦王朝對巴蜀地區在政治、經濟、社會層面的改造，使巴蜀逐漸洗去“戎狄”的身份，與秦逐漸融合、趨於一統。在這一“染秦化”<sup>⑨</sup>的過程中，巴蜀社會被外來文化切割和改造，被迫接受對秦王朝的政治認同、文化認同和身份認同。《華陽國志》在描述蜀人的地域特點時說蜀地：“與秦同分，故多

① 《春秋公羊傳·成公十五年》，《十三經注疏》（下冊），中華書局影印清嘉慶二十年阮元刻本，1980年版，第2297頁。

② 《尚書·牧誓》，《十三經注疏》（上冊），中華書局影印清嘉慶二十年阮元刻本，1980年版，第183頁。

③ 袁柯：《山海經校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0頁。

④ 袁柯：《山海經校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8頁。

⑤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一百六十六《州郡部十二·益州》，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808頁。

⑥ 《史記》卷十五《六國年表》，中華書局點校本，1959年版，第685頁。

⑦ 《史記》卷七十《張儀列傳》，中華書局點校本，1959年版，第2282-2283頁。

⑧ 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頁。

⑨ 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8頁。

悍勇。”<sup>①</sup>這一方面說明秦人融合邊疆地區土著族群的成效；另一方面，蜀人的外在形象被秦“虎狼之國”的形象所覆蓋，呈現出了“悍勇”的地域性格，已是秦漢時期國人能夠普遍接受的觀念。

### 三

巴蜀地區的對外交往，從現今考古發現的材料上看是十分久遠的<sup>②</sup>，至遲在戰國時代，蜀地與關中平原乃至中原地區進行交流的道路就已開通。但從流傳下來的文獻記載上看，數量有限，內容薄弱，對巴蜀地區對外交往的描述是在地域遙遠、文化隔閡存在的認知背景中展開的。

春秋戰國時期，巴、蜀兩國分別與各自的鄰國如秦國、楚國發生交往和接觸。有關巴國外交較早的記載可見於《左傳》。《左傳·桓公九年》載：（魯桓公九年），巴子使韓服告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聘於鄧。鄧南鄙攻鄆人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sup>③</sup>蜀地與中原聯繫最近的交通綫無疑是穿越秦嶺到關中平原，秦人的相關記載見於《秦記》，後來多為司馬遷在撰寫《史記》時採用。例如《史記·六國年表》載：“厲共公二年（前475年），蜀人來賂。”<sup>④</sup>又《史記·秦本紀》載惠文君元年（前337年），“蜀人來朝”<sup>⑤</sup>。

古代所謂“國”，原僅指諸侯的都城，郊外稱為“野”，後來“國”的範圍包括諸侯住居之所以及采邑的整個統治地區。古代人口稀少，國之間多荒地，彼此交往較少，多互不統屬，各自為政。由於相關記載很少，巴蜀與中原地區交往的詳細歷史過程不得其詳，但通過有限的幾次記載，我們大體可知，在“天下”格局下，國與國開始有了明確具體的內容，不僅彼此之間互相知曉“外國”的存在，並且開始有了政治的、禮儀的、文化的交往，互相饋贈禮物，甚至有了邊界的劃分。《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八引《蜀王本紀》載：“秦王恐無相見處，乃刻五石牛。”任乃強先生指出：“揚雄原語，謂秦作石牛，在褒谷兩王會晤處國界間。”<sup>⑥</sup>

① 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頁。

② 相關研究參見宋治民：《試論周秦漢時期中國西南交通》，收入四川大學歷史系編《中國西南的古代交通與文化》，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5-16頁。林向：《從考古新發現看蜀與夏的關係》，收入李紹明等編《夏禹文化研究》，巴蜀書社2000年版，第42-55頁。

③ 《春秋左傳·桓公九年》，《十三經注疏》（下冊），中華書局影印清嘉慶二十年阮元刻本，1980年版，第1754頁。

④ 《史記》卷十五《六國年表》，中華書局點校本，1959年版，第688頁。

⑤ 《史記》卷五《秦本紀》，中華書局點校本，1959年版，第205頁。

⑥ 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頁。

在先秦，周王朝為加強對四土內外諸侯、蠻夷、戎狄的控制與管理，推行“五服”制度，“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sup>①</sup>。“五服制”原則上規定周邊的少數民族有來向天子入貢、進獻和朝拜的職責。“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sup>②</sup>《詩經·殷武》篇亦載：“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周代為宗法封建時代，理論上周王之下的各個政治實體共尊周王為共主，大小諸侯地位上是平等的，但《秦本紀》中關於蜀“來朝”與“來賂”的記載說明，秦以“中國”自居，把蜀視作入貢的戎狄，對蜀皆稱“來”，不言“往”。這種交往中的“來而不往”，頗有一種禮儀以交君子、不以接夷狄的輕鄙意味。另一方面，蜀國似乎出於自尊和顏面，在與秦人的交往上愚弄對方，試圖欺辱秦國。據《華陽國志》記載，秦國為了吞併蜀地，不惜施以種種陰謀詭計欺騙蜀王。而蜀王送秦王假的珍玩，另又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sup>③</sup>“牧犢兒”指秦祖先為周王牧牛，諷刺其先世卑賤。《華陽國志·蜀志》載：“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蜀）雖奉王職，不得與春秋盟會，君長莫同書軌。”“君長莫同書軌”的表述讓我們注意到，秦、蜀等國偏居中國西陲，都具有風俗尚武、不重學術的文化傳統，《詩》《書》、百家語這些沒有本土文化根基的知識內容一直未能發展起來，因此與中原諸國的文化傳統交集並不多。華夏的禮儀標準、名分、風俗這類文化傳統，在巴蜀與外界的交往中，有的時候是以“不在場”的狀態呈現出來的。

巴蜀與秦楚等國的關係折射出的不僅是政治交往關係的演進，同時反映出此族與彼族、國人與野人開荒拓地、疆界和屬地逐漸相接的事實。由於國家間疆域的拓展，彼此間的地理距離由遠及近，各自模糊的形象也逐漸廓清。蜀國以自己為中心觀察秦國，秦國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和政治詞彙，而且的確是一個“虎狼之國”，正在兇狠而貪婪地注視著自己。

#### 四

從某種角度上說，春秋以來“周室微，諸侯力爭，爭相拼”的政治現實，使華夷的界限變得“內”“外”模糊不清。在涉及族群衝突時，秦為了逐漸漂洗掉自身的“戎族”色彩，多以“化內”自居，強調種族差異，視巴蜀為“化外”。不過一旦涉及戰略資源的爭奪，巴蜀地區就由“外”就變成“內”，其優越的自

① 王樹民、沈長雲：《國語集解（修訂本）》，中華書局 2002 年版，第 6-7 頁。

② 王樹民、沈長雲：《國語集解（修訂本）》，中華書局 2002 年版，第 204 頁。

③ 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23 頁。

然及區域條件，便成爲“天下”世界的一部分，強者可以乘機取索無厭。巴蜀被外面“異域”的眼光打量，其一是由於其具有優越的自然條件。考古發現證明，西南地區與外界的物質交流長期存在，西南地區的金礦、鹽礦是重要的戰略物質。其次是從宏觀區域地理形勢上而言，秦國要保持對關東諸國真正形成完整及穩定的軍事壓力綫，必須將關中地區與四川盆地聯成一體，兩者互爲屏障與輔翼，形成更大的控馭“天下”的優勢。<sup>①</sup>

因爲具有富庶的資源和有利的軍事戰略地位，巴蜀地區被中土人士關注。但是秦、楚等大國的眼光由傳統的“天下之中”地區轉到西南，應該不是一個短期的過程，似乎直到戰國中期，中原人士對巴蜀地區的看法並不統一和明晰。在秦庭一場關於伐韓還是伐蜀的辯論中，魏人張儀的眼光在東方，“得中原者得天下”，他認爲蜀地無論從“爭名”還是“爭利”的角度上都顯得分量過輕，不能幫助“王業”的建立。相反，司馬錯十分重視巴蜀地區的戰略價值，認爲“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材足以富民”<sup>②</sup>。張儀、司馬錯二人意見的分歧，究其原因，似乎是巴蜀地區的重要性在當時確實還沒有被世人充分發現或肯定。<sup>③</sup>

隨著“大一統”思想的逐漸發酵，巴蜀地區捲入全國的政治大綱，最終成爲秦人佈局天下的一枚重要棋子。公元前 316 年以後，隨著巴、蜀兩國被秦王朝征服，巴蜀“內屬”爲秦國版圖的一部分，巴蜀地區的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纔發生深刻改變。爲什麼秦人要征服巴蜀？問題不在巴蜀本身，“華夷”之爭祇是藉口。應該說，地緣格局與政治意識，大致奠定了當時中國的西南邊疆。從另一個角度上看，中國歷史上各種政治實體的對立與鬥爭，抵擋不了因頻繁接觸而引發的交流與融合。這一歷史趨勢，使得巴、蜀與戰國時代的其他小國一樣，由“外域之異邦”變成“中國之郡縣”，同時，春秋時期還縱橫出沒於中國周邊的“蠻夷戎狄”，在戰國後期，漸次融入華夏世界，最終難見痕跡。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① 朱士光：《秦國富強卒併諸侯之地理環境條件探析》，袁仲一主編，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論叢》編委會編《秦文化論叢》（第八輯），西北大學出版社 2001 年版。

② 《史記》卷七十《張儀列傳》，中華書局點校本，1959 年版，第 2283 頁。

③ 秦征服了巴蜀以後，形成了具有包有關中平原、四川盆地等區域在內的“秦地”，經濟實力大增，巴蜀地區極大的戰略意義恐怕纔進一步被證實。

## 灌縣“蜀學”傳承概述

施廷俊

**摘 要：**灌縣扼成都平原入川西北藏羌山區交通要衝，為古蜀國創基之地，鍾靈毓秀，山川形勝。自文翁創建“石室”，而“蜀學”肇興，灌縣人蜚聲庠序，二千年間，代有其人。昔有江源常氏、青城何氏、導江張氏、永康焦氏諸家族耕讀傳家，簪纓繼世，文脈綿長，史不絕書。延及有清、民國，題名錦江、尊經、國子監南學與北大、中大、南開、中山、武大、復旦、浙大、川大、華大、齊魯等高等學府及中央歷史研究院的學者不下千人，其人或馳聘教壇、政界，或效命疆場，並多令譽，且有以“名山事業”傳於後世者。

**關鍵詞：**蜀學；灌縣；岷江；錦江；尊經；學風

“蜀學”一詞，源於常璩《華陽國志·蜀志》。該書在記述西漢文翁治蜀興學功績時，讚歎“蜀學比于齊魯”。近代以來，對於“蜀學”的具體含義，言人人殊，或言文學，或稱哲學，難以詳解。就中華傳統學術而言，聯繫《史記》《漢書》《蜀王本紀》等史志中有關蜀地文化發展的記述，能否這樣認為：常璩所謂“蜀學”，乃是指自秦並巴蜀到東晉的六百年間，隨朝代更替、社會演進而逐漸發展成熟的具有蜀地特色的“學術文化”。

秦並巴蜀，創修都江堰，奠定秦國統一天下基礎，古蜀國民由“化外”蠻夷而逐漸“秦化”。稍後，秦朝建立，遷秦人、六國貴族後裔及富商巨賈至蜀地，中華大地“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文翁興教崇學，隨秦、漢“移民”大潮傳入的中原傳統學術文化也漸次在蜀地生根並逐漸得以廣泛傳播。自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中華傳統學術文化以儒家學說為中心；被“秦化”的蜀地經“儒化”浸染熏陶，歷經郭舍人（舍人一作文學）、司馬相如、落下閔、王褒、嚴君平（莊遵）、揚雄、譙周、陳壽、常璩等無數蜀地文人前後相繼，傳承發展，蜀地文教事業興盛繁榮，富有蜀地特色的中華傳統文化從此形成。簡言之，“蜀學”，乃是具有鮮明時代特徵、地域特色的“蜀地國學”。

歷史上，漢代、宋代和清代同光時期的“蜀學”成就卓越，因反映出當時社



會的需求、精神風貌而名揚中外。其各自成就、特點等，史不絕書，前賢時彥，熟焉能詳。茲但記灌縣“蜀學”有關情況於次。

### 灌縣“蜀學”概況

灌縣扼成都平原入川西北藏羌山區交通要衝，為古蜀國創基之地，鍾靈毓秀，山川形勝。秦併巴蜀，李冰開鑿都江堰，創開天府，澤被遐方，衣食足而知禮儀；文翁興學，巴蜀好文雅；漢武帝時，張騫通西域，灌縣成為“南方絲綢之路”上重要的物資集散地；司馬遷出使西南，都江堰名揚中外。東漢末年，張陵創道青城，灌邑山川增色。漢、唐以來，巴蜀地區曾多次接受移民。尤其是南北朝前後，巴蜀地區時而自立，時而屬南，時而歸北，灌縣成為通往西域的重要交通孔道和南北文化交匯之地。差異很大的南北文化在這裏成為融會儒、道、釋的一種多樣化的文化形式。

前人曾言，天下之佳山水在蜀，灌縣之山水甲於蜀中，而文化是山水的靈魂。准此，則有關山水的文化也是灌縣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時至今日，都江堰市既以古蜀國創基之地、“江源文明”和“南方絲綢之路”上的重要交通樞紐而享譽天下，青城山也以“道教祖庭”“仙源文化”“青城天下幽”蜚聲世界。都江堰、青城山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都江堰“放水節”也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因此，自漢代以來，灌縣學術昌明，人文薈萃，傳統學術事業繁榮興盛，英彥迭出，文采風流，史不絕書。

秦漢時期，蜀地始設縣級行政機構，因岷江橫貫灌縣南北，交通不暢，為便於管理，秦漢至唐代的一千多年間，灌縣都分屬三地，大致情況是：都江堰市古城區（原灌口鎮）及其以上山區屬綿虜（今屬汶川縣或汶山郡）<sup>①</sup>，河西隸屬江源縣（後為蜀州青城縣等），河東隸屬郫縣、彭縣（相繼為都安縣、導江縣等）。唐、宋時期，川西北高原民族紛爭不斷，灌縣成為邊防前沿，今都江堰市古城區為軍置[鎮靜軍、永安軍、永康軍、灌口砦（寨）等]所在，下轄青城、導江兩縣。元代改永康軍為灌州，撤銷青城、導江兩縣，隸屬灌州；明初降州為縣，直至1988年撤灌縣建都江堰市，灌縣成為歷史名詞。

在灌縣河東隸屬郫縣的漢代，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揚雄等“蜀學”代表人物都與此地有一定聯繫：嚴君平、揚雄是郫縣人，至今尚有衣冠塚留存故土，

<sup>①</sup> 據曹學佺《蜀中名勝記》轉引《水經注》《元和郡縣志》等史料：《水經注》：“江水又歷都安縣，即汶山郡治，劉先主所置也。”《元和郡縣志》：“灌口鎮，在導江縣西二十六里，後魏置。”《太康地志》：“都安，劉先主置，屬汶山郡；周武帝並於益州之郫，別於灌口置汶山縣。唐武德元年，改為盤龍縣，尋改為導江（縣）。”

百代馨香；司馬相如有墓道碑在灌縣城東十二里的劉海壩<sup>①</sup>；王褒則奉漢宣帝命到蜀地尋找金馬碧雞，撰《金馬碧雞賦》<sup>②</sup>，灌縣遂有鄉名“金馬”，橋名“碧雞”，留下千秋佳話。

在灌縣河西隸屬江源縣的時代，常璩因《華陽國志》而名標史冊，以常璩為代表的“江源常氏”等家族的事跡往往分別被記載到崇慶縣、灌縣的鄉乘史志上。清風亮節，奕世流傳，索其遺蹤，猶有存者。

而自漢、晉“江源常氏”以後，歷南北朝至唐末五代，因社會動亂，典籍散佚，除佛、道教文化與個別流寓的著名文人資料偶有存在以外，灌縣本土學人事跡基本無考，學術傳承黯然斷綫。祇有“青城徐氏”一族，因美女“花蕊夫人”有宮詞百首留存，並以《述國亡詩》呈宋太祖引起轟動效應而名標史冊。茲敘宋代以後，灌邑“蜀學”傳承概況於次。

唐末天下大亂，唐求、杜光庭、張令問等流寓灌縣，並相繼隱居青城，潛心著述。影響所及，蜀人多孜孜向學而不願出仕。宋初，李旼、張及等永康軍學子，在益州知州張詠（946—1015）的誘導、薦舉下，與張逵一同赴京應試，俱登進士第，任員外郎，給四川學子帶了個好頭。據范鎮《東齋記事》：“初，蜀人雖知向學而不樂仕宦。張公詠察知其有聞於鄉里者，得張及、李旼、張逵。屢召與語民間事，往往延入臥內，從容款曲。故公於民情無不察者，三人佐之也。其後，三人皆薦於朝，俱為員外郎，而蜀人自此寢多仕宦也。”

李旼（雍正《四川通志》作華陽人），字渭卿，一字渭父，是被奉入灌縣文廟鄉賢祠的第一人。淳化中（990—994），李旼登進士第，歷任校書郎、懷寧主簿、大理寺丞、懷安知縣、榮州知州等職。在任勤於政事，關心民瘼，秩滿致仕。其自榮州歸，上書力陳鹽法危害。終蠲免每年賦稅三十萬斛，免除三百一十五家人的雜役。他一生手不釋卷，撰《道德經疏》二十卷、《張乖崖語錄》二卷、《穀子》三十卷以及歌詩雜文著述七十卷。

又，在榮州知州任上，李旼曾應昭覺寺住持延美禪師之請，撰《重修昭覺寺記》一文，被收入《全蜀藝文志》卷三十八，成為記載成都昭覺寺歷史的文獻典

① 司馬相如墓道碑，原碑高 170 厘米，文為“漢中郎將文苑令司馬相如墓道”。款為“大清嘉慶四年（1799）歲次己未仲秋之吉灌縣知事徐鼎敬立”。1986 年文物普查時，在治東羊子橋（今聚源鎮羊橋村三組）發現，僅有上半截（現移存都江堰市文物局）。據當地村民介紹：另外半截（即下半截），1970 年代，幸福公社修水輪泵時，用來做了底座。據唐代《元和郡縣志》載：“司馬相如葬于四川導江縣東二十里。”清乾隆《灌縣志》：“司馬相如墓在治東十二里劉海壩。”《都江堰市金石錄》亦載有嘉慶四年灌縣知事徐鼎立“漢中郎將文苑令司馬相如墓道”碑一事。而民國《灌縣志》則據《史記》所載相如死在西京茂林，則墓不當在此。即櫬返蜀，亦當葬成都等事理推斷其非。

② 王褒《金馬碧雞賦》：“持節使者王褒，敬移南岩，金精神馬，縹縹碧雞，處南之荒。深溪回澗，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于唐虞，澤配三皇。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兮翔兮，何事南荒！”